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二編 15

當代臺灣文學的 家族書寫

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下）

黃宗潔・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
刊

二 編

第 15 冊

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
——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下）

黃宗潔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下）／
黃宗潔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15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編：第 15 冊）

ISBN：978-986-322-239-2（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733.08

102002851

ISBN-978-986-322-239-2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322-239-2

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下）

作 者 黃宗潔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28 冊（精裝）新臺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名詞釋義	3
一、家族書寫	4
(一) 幾個相近的範疇	4
1. 自傳文學	4
2. 私小說	5
3. 大河小說、家族史小說	6
4. 成長小說	7
5. 尋根文學	8
(二) 家族書寫與各領域之交集	9
(三) 家族書寫：一個解釋性的界義	11
二、認同	12
第三節 研究範疇	14
一、文學裡的家族：略論家族書寫之發展脈絡	14
(一) 從傳統到現代	14
(二) 解嚴以來台灣文學中家族書寫之發展脈絡	17
二、歷來研究成果	20
三、文本的選擇	21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23
一、研究方法	23
二、篇章架構	26
第二章 家族書寫中的「自我」認同	29
第一節 姓名與身分認同	29
一、姓名與認同	29
二、姓氏——建立歸屬的符號？	31
三、名字——指向「宿命」的寓言？	35
第二節 性別、身體與認同	38
一、性、性別與身分	38

二、女性：性別角色的學習與困惑	40
三、男性：性、身體與認同	45
第三節 早期記憶與自我認同	49
一、早期記憶的意義與重要性	49
二、孤單的童年記憶：陳玉慧——不要留下 我一個人	51
三、畏怯的童年記憶：鍾文音——不安的夜 市之旅	55
四、焦慮的童年記憶：駱以軍——他們在說 些什麼？	58
小 結	62
第三章 家族書寫中的「家族」認同	65
第一節 父系認同的家族書寫	65
一、(尋)父之旅：《逆旅》	65
二、逃亡者的後裔：《月球姓氏》	68
三、父親的病：《聆聽父親》	73
第二節 母系認同的家族書寫	78
一、重現昨日的母女愛怨：《昨日重現》	78
二、開啓塵封的家庭秘密：《海神家族》	85
第三節 家屋、生活空間與認同	91
一、家屋、生活空間與認同	91
二、生活空間所映照出的自我——「我是 誰？」	92
三、個人化空間中流露的價值觀——「我的 家人是什麼樣的人？」	95
四、當家與外界發生對話——「家的位置與 意義？」	99
小 結	103
第四章 家族書寫中的「國族」認同	105
第一節 家族書寫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	105
一、「外省父親」的見證：一九四九年的 逃亡	106
二、噤聲的年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112

三、見證的書寫與書寫的見證	117
第二節 家族書寫中的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	119
一、族群、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	120
(一) 族群與族群想像	120
(二) 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	121
二、家族書寫中的族群認同	125
三、家族書寫中的國族認同	131
(一) 敘述對象的認同	131
(二) 敘述者的認同	135
(三) 作者自身的認同	138
第三節 家族書寫中的文化認同	141
一、飲食、鄉愁與認同	141
二、語言與認同	147
三、宗教與認同	152
小 結	158

下 冊

第五章 綜合討論：如何書寫？怎樣認同？	161
第一節 「家」在何處？——省籍與出生地的認同	161
一、省籍的認同與困境	162
二、出生地的回歸與追尋	167
第二節 「待續／敘」的身世系譜與認同	171
一、父系認同書寫中的母親形象與母子／女關係	172
(一) 「不在場」的母親：《逆旅》	172
(二) 「失去口述能力」的母親：《月球姓氏》	175
(三) 「待續」的母系身世：《聆聽父親》	178
二、母系認同書寫中的父親形象與父女關係	181
(一) 父親過世時，我還太年輕：《昨日重現》	181

(二)「有時我覺得我已把父親殺死了」： 《海神家族》	183
第三節 書寫家族的幾種形式與藝術	187
一、《逆旅》中的魔幻書寫	188
二、《月球姓氏》中的家庭劇場	191
三、《昨日重現》中的影像重現	194
四、《聆聽父親》中的說書技藝	197
五、《海神家族》中的儀式書寫	201
六、書寫的核心與認同的核心——想像與 真實的辯證	204
小 結	208
第六章 結論：成果與展望	211
第一節 本論文之研究成果	211
第二節 當代台灣家族書寫與研究之展望	215
一、當代台灣文學中家族書寫之展望	215
二、後續之研究方向	218
(一)以作家為中心的研究	218
(二)以家族書寫與認同為中心的研究	219
參考文獻	223
附 錄	
附錄一 郝譽翔訪談紀錄	241
附錄二 駱以軍訪談紀錄	259
附錄三 陳玉慧訪談紀錄	275
附錄四 鍾文音訪談紀錄	291
附錄五 作家小傳：張大春	313

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
——以認同爲中心的探討（下）

黃宗潔 著

第五章 綜合討論：如何書寫？ 怎樣認同？

第一節 「家」在何處？——省籍與出生地的認同

在本論文的前幾章，筆者分別從個人、家族與國族的角度探討了家族書寫作品中的認同。本文所選的作品雖然都與認同息息相關，但由於每位作者在寫作時所偏重處理的問題各有不同，不僅呈現出認同問題的複雜，也造就了家族書寫作品的多元面貌。本章就試圖進一步從作者們不同的書寫方式和取材角度加以探討，藉由觀察他們書寫家族故事時的切入點與文學、藝術技巧，期能更深入地了解這些風格形式各異的家族書寫文本。

有關於「切入點」的部分，基本上如前文所言，可分為「父系身世」與「母系身世」兩大類。關於這兩類作品中所呈現的認同問題，已在本文第三章中加以析論，故筆者在本章第一節中將著重於探究作者為何選擇以「父系」或「母系」身世為書寫的主軸？如前所述，由於家族書寫原本就是夾雜著真實與虛構的文類，因此文本中之所以偏重於思考和書寫某些特定的認同問題，與作者自身的經歷、背景、價值觀自然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首先，作者對於省籍和出生地的認同傾向，往往影響了他們對「家鄉」此一概念的界定，並進而造成他們選擇父系或母系身世的書寫。另一方面，那些在作品中篇幅較少，看似被作者忽視的家人，在作品中的形貌為何？他們與作者的認同傾向之間又可能有何關聯？則是本章第二節所探討的議題。簡言之，本章前兩節擬處理的，是作品中說得不多、或刻意不說的部份。但是作者既然不說，

詮釋者又何從理解呢？其實正如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所言，那些缺席的——作品中「沒說的」（not-said）——事實上「會以流利的沉默這種形式出現在文本中」，文學評論的工作正是要去完成文本所留下沒說的部份，而不僅只是完全置身在作者所營造的文本空間中。^{〔註1〕}至於這五部作品採用的藝術形式與技巧，則於第三節加以論述。

一、省籍的認同與困境

在本文第四章討論族群認同時，筆者曾針對文本中所反映之「外省」與「本省」族群想像加以析論，並指出在本論文主要討論的幾部家族書寫作品中，以書寫「外省父親」為主的作品族群意識較明顯。如果再將這五部作品加以約略區分為「父系認同」與「母系認同」兩大類，又可發現書寫父系身世為主的三位作者：駱以軍、郝譽翔、張大春，恰好都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這似乎意味著外省第二代作家在選擇身世的切入點時，往往較為在意父親的外省身世，並且因此在文中反映了較多有關族群認同等相關議題之思考？但是這樣的推論方式，未免過於武斷——如同前文所提過的，同樣也有「外省父親」的陳玉慧與利格拉樂·阿媽，顯然就較為傾向認同自己的母系身世。當然，五部作品之取樣絕不可能建立一個有意義的統計，並藉此歸納出「父系認同與省籍是否具有相關性」之結論，因此，筆者在此所要討論的問題，並非「為何是他們在書寫父親」？而是「他們為何要書寫父親」？更進一步來說，就是「父親的身世」對他們而言造成了什麼樣的意義，以致讓他們覺得父親的身世是比母親更須著力書寫探究的？「省籍身分」真的影響了他們的認同或是造成某種困擾嗎？雖然幾位作者的狀況並不盡然相同，但透過分析文本中有關省籍的種種書寫，以及作者本身的「表態」，都或多或少地讓我們看到省籍概念對身分認同造成的影響。

基本上，當我們使用「省籍」這個概念來做為一種身分的區隔時，就等於已經承認並接受了以「父權」為主的社會結構，因為不論「本省」或「外省」，都是以父親的籍貫為認定的標準，因此當作者以「外省第二代」的身分自居，以父系身世為書寫的主調自也不令人意外。然而父親的省籍對他們而言究竟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郝譽翔在《逆旅》一書的後記中，相當程度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註1〕 見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8, 89.

直到今天，別人問起我的籍貫，我照舊會說山東，這當然是一種頑固、無可救藥，而且最糟糕的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省籍情結。但我卻無法漠視下列一長串的疑問：我是如何誕生在這個島嶼上的、假如一九四九年我的父親沒有搭南下廣州的火車、假如國民黨不是如此昏庸腐敗、假如台灣人和外省人不曾互相排斥……〔註2〕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對省籍的認同仍舊是源於「我從哪裡來？」、「我歸屬於哪裡？」這類問題的疑問而產生。我的身世是被我父親的身世所決定，而父親來自一個如此遙遠，無法企及的時空，他（我）的故鄉從而成爲充滿想像空間的神秘領域：

我確實覺得山東就是我的故鄉，精神上的故鄉，我從小就對它有一種想像。……想像我的生命其實有另外一種可能：我可能在山東長大，我可能變成另外一個人。爲什麼我現在活著，原來我的命運有另外一種可能存在，我會很好奇「另一個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所以就會對那種轉身就錯過的那一秒，充滿了無限的好奇。〔註3〕

值得注意的是，她對「故鄉」所懷抱的情感，是想像與好奇，而非思念與認同，因此陪父親回大陸的返鄉之旅，與其說是「回家」不如說是一場「探險」（參見頁 36～37）。但是當神秘的原鄉成爲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場景時，貧乏的黃土抹煞了所有想像的可能，遙遠的距離只能換算成生活方式的強烈差異，而不是童話故事般的奇遇與驚喜——父親描述中是個山寨的老家，不僅沒有想像中的「高空彈跳或荒野的殺伐獵」，相反地，「南坦坡村一如其名，你兩三步就跨上村中唯一的小土丘。」（頁 37）在這裡，山東土話比英語更難聽懂；「上街耍」的意思則是「大家搬著板凳，到巷口圍成一圈，搬長弄短。」（頁 38）尋根之旅在炎熱的天氣下逐漸變成一場令人想逃離的「惡夢」（頁 38），故鄉其實是他鄉，在外省第二代的身上，恐怕是再真切不過的感受。

但如果「安徽無爲」、「山東萊陽」的省籍身分，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個「從來不瞭的地名」〔註4〕，爲何還執意要書寫父親？因爲「他像是有關於『我爲何要寫小說』、『我爲何總愛寫一些滑稽之人』或我爲何總是如此亢鬱

〔註2〕 見郝譽翔《逆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3月初版），頁189。本節中再度引用此書時僅註明頁碼，不另加註腳。

〔註3〕 見附錄一、郝譽翔訪談紀錄，頁280。

〔註4〕 見駱以軍《月球姓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頁246。本節中再度引用此書時僅註明頁碼，不另加註腳。

憤懣……這一切謎面底線頭。他是關於『我……』這一切相關字源最初的那個空缺。」（頁 242）駱以軍在《月球姓氏》一書中如是說。對自身身世的好奇與追索原本是無關省籍的，但「外省父親」的身世對子女來說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如果不是四九年我父親跑得快，莫名其妙跑來台灣和我娘來那麼一下子，也就沒有我了。」（頁 244）對父親身世的懷想，關鍵其實在於四九年那一場戲劇性的遷移，父親從如此遙遠的彼岸來到這裡，開啓了「我」的身世。如胡衍南所言：

外省第二代的身世，決定於他們父親某一次的逃亡、某一次的不告而別、某一次的陰差陽錯、某一次的……，所以當他們（像駱以軍一樣）探究起自己的身世、特別是考索至當初那個決定性的時刻，等在那裡的答案總要讓他們對各色的歷史偶然發出唏噓之嘆。〔註 5〕

「如果不是我父親跑得快」，那麼我的身世是否就會「有另一種可能」？駱以軍和郝譽翔對身世問題的思考在此產生了某種交集。我的身世是由歷史的偶然所造成，於是「為何我們在這？」「為何他當初會沒頭沒腦地離家？」「為何他那時要跟著國民黨？」……（頁 168）這一切的疑問遂成為子女終身追索且試圖解答的問題。

但在追尋父親身世並試圖建立認同的同時，子女終將發現，自己所由來之地（父親的省籍）所提供的身世符號，是如此陌生飄忽：

我曾遇見一位學弟，……他從小學到大學，各種身分資料的籍貫欄皆是填寫著「察哈爾」。他說：「我是察哈爾人。」他是到很後來才知道：現在中國的行政區裡，已經沒有「察哈爾」這個地方了。察哈爾省早已被併入松花江省還是嫩江省裡去了。（頁 121）

對於並不真正出生與生活於彼岸的「外省第二代」來說，省籍的名稱終究只能成為一個神秘且陌生的身世符號。一旦政治的版圖改變，那得以定位自己身世標記的名稱彷彿也隨即消失：當察哈爾省在地圖上除名，「察哈爾人」該如何尋回身世認同的線索？或者說，當原來的「察哈爾人」變成「松江人」或「嫩江人」時，他們轉換的究竟是「身世」還是「指稱身世的名稱」？這

〔註 5〕 見胡衍南〈「外省第二代」作家的父親（家族）書寫〉，收錄於《兩岸現代文學發展與思潮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編，2004 年 10 月），頁 142。

個例子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以省籍作為身世認同象徵的空洞。〔註6〕

如果說省籍所提供的「身世名稱」無法解決認同問題，為什麼這些外省第二代作家還要如此「政治不正確」地懷抱這個身世符碼呢？本文第一章提到的認同理論，或許足以提供一些線索。如前所述，自我認同「部分地是由於他者（others）的承認（recognition）、承認的缺席（absence）與誤認（misrecognition）所形成的。」〔註7〕個體與他者互動的過程中，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並建立自身的歸屬，從而形成所謂的「社會的認同」。正因為他者的承認對自我認同具有相當的影響，當自己的身分屬於不被認同的一群時，個體自然會產生一定的焦慮。如同胡紹嘉在分析陳文玲（1962～）《多桑與紅玫瑰》一書時所指出的，陳文玲之所以對母親的「壞女人」形象進行說明與抗辯，正是出於某種希望他者認同的心理：

「我」在追溯、尋找母親印記的同時，也在辨認長成於其中的自己，而這個「自我的認同」又是與他人對母親的看法與評斷息息相關的。因此，對於母親的私我敘事，除了在知道「我是誰」，並為一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外，還是一種「要求他人的承認」的社會行動。〔註8〕

外省第二代作家的父親書寫，在某種程度上亦可做如是觀。隨著近年來本土化的潮流與外省第一代的逐漸凋零，一方面令第二代感到憂傷惆悵：

台灣本土化的潮流，它確實標誌著一個族群的從此走入歷史，就是所謂外省族群，當它要走入歷史的時候，我們就會發覺我們好像在為它做紀念碑。因為這個東西如果不寫，不是說要為歷史負責，而是說你自己心中的那種惆悵吧，你眼睜睜地就看著它走入歷史，然後從此煙消雲散的惆悵。……我們看著這一輩的人好像從此就要消失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然後台灣本土化的論述也把這批人遺忘了，早就把他們除名在外了的時候，內心的一種惆悵。〔註9〕

〔註6〕 本段引自拙作〈我們是那樣被設定了身世：論駱以軍《月球姓氏》與郝譽翔《逆旅》中的姓名、身世與認同〉，《第七屆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北：文訊雜誌社，2003年11月初版），頁176。

〔註7〕 見孟樊《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文化有限公司，2001年6月初版），頁18。

〔註8〕 見胡紹嘉〈于秘密之所探光：遭遇的書寫與描繪的自我〉，收錄於《應用心理研究季刊》25期：生命書寫與心理健康（台北：應用心理研究雜誌社出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發行，2005年3月出版），頁49。

〔註9〕 見附錄一、郝譽翔訪談紀錄，頁282～283。

另一方面，父親被主流論述、主流價值排除與遺忘，也就意味著「承認的缺席」，如果說父親的不被承認（認同）就等同於「我」的不被認同，這無疑會引發第二代的焦慮：老人們逐漸死去與被遺忘，那麼老人的子女呢？社會是否也將無情地把他們排除在外？透過書寫，外省第二代作家試圖留下父親的故事與歷史，這是對遺忘的反抗，也是對認同的渴望。

值得一提的是，張大春的《聆聽父親》一書，雖然在分類時亦可歸為「外省第二代家族書寫」的行列，但不同於在發現父親口中山東流亡學生的「傳奇故事」為真實的歷史，震撼之餘開始轉身拼湊父親過往點滴的郝譽翔〔註10〕，以及常被認為「耽溺於（外省）父親的身世」的駱以軍〔註11〕，張大春的家族書寫，在「外省第二代身分認同」這個部分其實是著墨甚少的。《聆聽父親》的問市，雖然似乎已打破了一直以來，張大春作品「不輕易被捲入『身分』議題、不易被身分議題所設定」〔註12〕的寫作特色，讓人意外「原來張大春也可以抒情、可以真誠、可以老實」〔註13〕，成為一部宛若「為一個集體流亡的族群鑄碑立傳」、「搶救家族記憶」〔註14〕的作品。但事實上張大春即使在抒情寫實的當下，他還是與文本保持了一個安全的距離，因此在敘述五代祖先故事的同時，他維持了一貫的說書口吻，架構出一個山東家族的「傳奇」故事。雖然敘述者「我」仍不時現身，整體而言客觀的敘述仍遠多於主觀的情感流露，這或許是作者有意的情感抑壓或寫作手法〔註15〕，但在這樣的呈

〔註10〕 參見郝譽翔《逆旅》〈後記〉（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3月初版），頁187～190。

〔註11〕 駱以軍在蕭菊貞《銀簪子》一書的序文〈數字正在滴滴倒數〉中提到：「我想起年來一些尊敬的詩長輩這樣不經意地問我：『為何要那樣耽溺於你（外省）父親的身世？』我總是蒙混失焦、語焉不詳：因為我父親他……正在死去；因為時間所剩不多……」（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9月初版），頁19。

〔註12〕 見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收錄於氏著《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台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有限公司發行，2003年1月初版），頁205。

〔註13〕 見胡衍南〈「外省第二代」作家的父親（家族）書寫〉，收錄於《兩岸現代文學發展與思潮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編，2004年10月），頁150。

〔註14〕 同前註，頁155～156。

〔註15〕 張大春曾在接受採訪時，透露寫作此書時「哭了好幾回，經常推開電腦不能竟書。」可見作者在寫作時，仍是洋溢濃厚的情感。見徐淑卿〈聆聽張大春，帶著笑聲的家族故事〉，《中國時報·開卷周報》，2003年8月3日。有關《聆聽父親》的寫作手法，於本章第三節將進一步加以論述。

現方式下，張大春仍舊迴避了與「身分議題」正面衝撞。

因此，張大春的「省籍身分認同」是隱而不顯的，某個程度上來說，書寫和敘述的本身已經代表了一種認同，也就是說，當他選擇書寫山東老家、父祖的故事之時，已經透過書寫的「行動」本身表現出他的身分認同；但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我從哪裡來？」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山東濟南府』……這樣說的話，哲學的『我從哪裡來？』還有什麼可問的呢？」〔註 16〕這個例子說明了認同問題的複雜，正因為足以代表身分的「選項」眾多，對個人來說重要性自然有優先順序的差異，省籍不是張大春用以定位身分的優先指標，但這種選擇無關對錯，只是價值觀的不同使然。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即使隸屬同樣的族群、同樣的社會身分，個體在理解並選擇自身的位置時，仍舊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答案，這或許也正是身分認同的難解與迷人之處。

二、出生地的回歸與追尋

從上述的討論，已可看出省籍對建立身分認同來說，雖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然而對並不出生成長於彼岸的外省第二代來說，他們的省籍認同與其說是建立在「省籍」本身，不如說是源於對父親的認同。那麼倘若父親的省籍身分無法以「山東濟南」、「安徽無為」這樣單純的地名加以指認時，個人又該如何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陳玉慧在《海神家族》一書中，就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凸顯出以省籍來回答「恁是都位人？」這個問題，是如何地獨斷簡化：

「我的曾祖父是蒙古人，蒙古白旗人，他和家人在遷移北京後，與江蘇人的曾祖母結婚。我的祖父和父親都在北京出生，後來全家搬到安徽當塗附近種田做買賣，父親十八歲離家後便到台灣來，與我母親結婚，我的外婆是日本人，外公是福建來的台灣人。」我說得太快，並且有意說得很快，我很想知道他認為我是什麼人。司機要我再復誦一次，然後他做下結論：「你的父親是應該算北平人，你不是台灣人，你是外省人。」〔註 17〕

〔註 16〕 見張大春《聆聽父親》（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3 年 7 月初版），頁 57。

〔註 17〕 見陳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4 年 10 月初版），頁 10。
本節中再度引用此書時僅註明頁碼，不另加註腳。

本省／外省這種粗糙的二分法，忽略了身世血統中多元融合的可能，而被省籍區分法所排除在外的母系血統，難道不是我們二分之一的身世淵源？有鑑於此，陳玉慧和鍾文音兩位女性作家，乃從母系身世為書寫的重心。陳玉慧之所以選擇以母系身世出發，以出生地而非省籍做為尋根之旅的起點（及終點），除了如她所說對父權的不耐、以及父親的缺席之外〔註18〕，也是因為她那來自多元族群的家族成員，原本各自背負著各自的身世與眼淚，最後卻在台灣這塊土地產生交集，發生命運的相會：來自琉球的外婆、先祖從漳州過台灣，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外公、四九年從大陸來台的父親，……台灣也許不是故事的起點，卻絕對是轉捩點。在回顧家族故事之後，她得以用一種全新的角度去觀看親人生命中的無奈，也對自己的身世／身分有更深刻的體認：

「我常懷疑，但我無需懷疑，像我這樣的人便是台灣人。」〔註19〕了解這樣的書寫背景之後，我們自能體會何以「陳玉慧所界定的台灣人絕對涵蓋了整個光譜：不出生於台灣的（像外祖母）；大半生都不生活於台灣的（像「我」、叔公）；台灣意識不強的（像外祖父）；甚至根本不認同台灣，只認同中國的（像父親）」〔註20〕，對於《海神家族》中有關「台灣人身分」的多所著墨，也方能跳脫意識形態上「愛台灣／不愛台灣」的粗糙二分法，掌握小說中對身分認同的深刻思考。

基本上《海神家族》寫的是一個回家（home coming）的故事，每個家族成員以不同的形式回到家，包括敘述者、神像、甚至已逝的魂靈。〔註21〕如同陳玉慧所言：無家（或家）一直是她的人生課題〔註22〕，在很年輕時就「只是為了離開家而離開家」（頁67）的她，在國外多年的生活，使她用另一種眼光和角度來思考關於家、身分、認同等問題。因為身在國外，出生地的意義對她而言與其說是「台中」，不如說是「台灣」。〔註23〕事實上早在《巴伐利亞的藍光》一書，陳玉慧就已展現出對台灣的複雜情感，附錄〈給台灣的一

〔註18〕 參見附錄三、陳玉慧訪談紀錄，頁307。

〔註19〕 見明夏文，陳玉慧譯〈丈夫以前是妻子——評論家丈夫明夏專訪小說家妻子陳玉慧〉，收錄於陳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4年10月初版），頁327。

〔註20〕 見顏擇雅〈台灣女性的家族史觀〉，《民生報·A10版》，2005年1月23日。

〔註21〕 同註19，頁332。

〔註22〕 同註19，頁326。

〔註23〕 《海神家族》中提到：「重新回到我出生之地，那個叫台灣的島。」見陳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4年10月初版），頁8。

封信〉當中，以「無名的國度」、「在一個叫福爾摩沙的地方」、「在一個叫『埋冤』的地方」、「在一個叫中華民國的地方」、「在一個叫『台澎金馬』或者『中華台北』的地方」、「在一個叫台灣的地方」等文句，呈現彷彿足以用來稱代「台灣」的各種名稱。〔註 24〕台灣的各種名字，凸顯出台灣複雜的身世與命運，眾聲喧嘩，令人「只覺得熱與苦」〔註 25〕，但是在回頭思索台灣這個島嶼的身世時，她「感受到自己的命運和台灣有多相像」。〔註 26〕年輕時她急著離開缺乏溫暖的家，但透過小說創作「檢視過去的斷絕」之後，她體會到「自己和台灣勢必無法分割。我現在做的便是回到自己出發的地方，……」〔註 27〕只有回歸出生之地這個生命的起點，檢視構成家族的複雜源起，看到每個人所背負的身世何其沉重，小我歷史又是如何受到大我歷史的影響與操縱，或許才能成為與家人和解的開端。而「母親」和「出生地」在認同上為何常被互相連結，在鍾文音的作品中有更清楚的呈現。

如果沿用「省籍」的框架來看，在本論文討論的幾位作家中，父母均來自南方鄉鎮的鍾文音，是唯一一位所謂的「本省籍」作家。這也使得鍾文音在思考「原鄉」的問題時，與其他幾位作家有著不盡相同的視角。父母來自相同的土地，且這塊土地亦是她自身出生成長之處，讓她在建立自身的身分歸屬時，少了一些懷疑與困惑。另一方面，土地所象徵的原始生命力、勞動力與堅韌踏實的毅力，在在與「母親」形象相連結，對「出生地」的認同與「母親」的認同，在此得到了連結。鍾文音曾在訪談中表示，「母親、情人、土地」對她來說是比較切身的議題，因此書寫時會優先從這些切身的感受去處理。〔註 28〕這也相當程度地說明了她選擇以母系身世為主要書寫視角的原因。

不過，儘管鍾文音無需經歷外省第二代那種「故鄉其實是他鄉」的失落感，並不表示她對出生地的認同，就是毫不遲疑地全盤接受。相反地，她對出生地雲林其實仍有一些矛盾與複雜的情感。她曾說：「台北不是我的家，雲

〔註 24〕 見陳玉慧《巴伐利亞的藍光》（台北：二魚文化有限公司，2002 年 4 月初版），頁 304～313。

〔註 25〕 同前註，頁 312。

〔註 26〕 見明夏文，陳玉慧譯〈丈夫以前是妻子——評論家丈夫明夏專訪小說家妻子陳玉慧〉，收錄於陳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4 年 10 月初版），頁 327。

〔註 27〕 同前註，頁 327。

〔註 28〕 見附錄四、鍾文音訪談紀錄，頁 324。